

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問題

洪 金 富*

摘 要

元朝有九位皇帝有蒙古語稱號。這些稱號究竟是生前既有的尊稱，或是死後才獲得的廟號，本文試圖解答。目前可肯定，稱號成吉思汗既是太祖鐵木真生前的尊稱，也是死後的廟號。至於其他八個稱號，如世祖稱號薛禪可汗等，則有傳統的廟號說及新起的尊稱說。本文廣求漢文、蒙文、波斯文史料，質疑尊稱、廟號兩說的正確性，提出「尊稱廟號合一說」，認為薛禪等稱號既用於皇帝生前，亦用於死後，簡單明瞭，易懂易記，符合蒙古人渾厚質樸、不事文飾的特性。漢族傳統的繁文縟節，既有名，又有字、號，諡上加諡、號外有號，蒙古人不懂、不學、不用。元朝皇帝的漢語尊稱、諡號、廟號，三者判然有別。但是他們的蒙古語稱號，生前死後一以貫之，固不必強為分別也。

關鍵詞：元朝皇帝、蒙古語稱號、尊稱、廟號、避諱

一、緣 起

拙編《遼宋夏金元五朝日曆》附錄有五朝〈帝王錄〉，介紹各朝歷代帝王的生平大略，包括帝王的名諱、字號、父母、生卒及即位日期與地點、年壽、葬地、諡號、廟號等。遼宋金元四朝，大抵以正史為據，夏則以《西夏書事》為主。率皆照錄原文，殊少更動，蓋原書所載大抵正確，不煩攷正也。

惟〈元朝帝王錄〉內，關於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惠蒙復旦大學姚大力教授指出，尚有商榷之餘地。按所謂蒙古語稱號，如成宗稱號完澤篤之類

*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是。姚教授認為這類稱號，是皇帝在位之時既已有之的尊稱，而不是《元史》說的皇帝駕崩之後才有的國語（蒙古語）廟號。姚教授提出的幾條史料證據（詳後），的確可以支持他的尊稱說。惟廟號一說出諸正史，由來已久，故而眾信不疑，從未受到挑戰。1987年，杭州大學黃時鑒教授撰〈元朝廟制的二元性特性〉，即認為元朝皇帝具有雙重廟號，如「完澤篤」為蒙古語廟號，「成宗」為漢語廟號，雙重廟號是元朝廟制二元性的一個表現。

姚黃二教授所見孰是孰非，似有一攷之必要，蓋歷史貴在實事求是，而拙編《五朝日曆》雅不願以訛傳訛也。故自奉到姚教授擲書賜教後，我即廣求史料，思索解答。惟限於時間、囿於聞見，我所能把握的史料極其有限，其中尚且不乏難以卒讀者。職是之故，尊稱、廟號兩說，其是非曲直，我依然不能斷。所以草成此文，不過拋磚引玉，兼志對姚教授賜教之謝意耳。

茲先將元朝皇帝的蒙古語名諱和稱號列表如下，譯字一遵《元史》諸帝紀文，其它異譯一概從略。¹

| 漢語廟號 | 蒙古語名諱 | 蒙古語稱號 |
|------|----------------------|----------------------|
| 太祖 | 鐵木真 Temüjin | 成吉思汗 Činggis Qan |
| 太宗 | 窩闊台 Ögödei | |
| 定宗 | 貴由 Güyüg | |
| 憲宗 | 蒙哥 Möngke | |
| 世祖 | 忽必烈 Qubilai | 薛禪 Sečen（睿智） |
| 成宗 | 鐵穆耳 Temür | 完澤篤 Öljeitü（吉祥、福壽） |
| 武宗 | 海山 Qaišan | 曲律 Külüg（俊傑） |
| 仁宗 | 愛育黎拔力八達 Ayurbaribada | 普顏篤 Buyantu（善者、福者） |
| 英宗 | 碩德八剌 Šidebala | 格堅 Gegēn（光明、英明） |
| 泰定帝 | 也孫鐵木兒 Yisün Temür | |
| 天順帝 | 阿剌吉八 Arigiba | |
| 明宗 | 和世琜 Qošila | 護都篤 Qutuγtu（有福的、有祿的） |
| 文宗 | 圖帖睦爾 Tuγ Temür | 札牙篤 Jayātu（命定的、有緣的） |
| 寧宗 | 懿璘質班 IrinJibal | |

1 順帝的蒙古語稱號，《元史》不載，茲據《蒙古源流》及《黃金史綱》等書補。

| | | |
|----|-------------------|------------------|
| 順帝 | 妥懽貼睦爾 Toyon Temür | 兀哈篤 Uqayatu (明智) |
|----|-------------------|------------------|

按除少數例外，元朝皇帝都有漢語尊號、諡號、廟號，三者分別得很清楚，不會混淆。至於他們的蒙古語稱號，今所知者有九帝九號，如上表。第一個是太祖的稱號「成吉思汗」。它是鐵木真生前的尊稱，絕非死後的追諡，人盡皆知，毫無可疑。至於它後來是否兼用做廟號，則是另外一個從來沒有人提過的問題，這裡暫且不表。太祖之外其餘八帝八個蒙古語稱號，究竟是生前尊稱，或者是死後廟號，如前所述，黃、姚兩教授意見相左。其實早在二十多年前，吾師札奇斯欽教授即已受到這一問題的困擾。他在《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中說，「元文宗之蒙語尊稱或諡號為札牙篤可汗」。²既排除了廟號，又徬徨於尊稱、諡號間；而在同年出版的《蒙古黃金史譯註》中，則以為稱號忽都篤、烏合噶圖是明宗和順帝的廟號。³最近問世的《元史辭典》一樣在尊號、諡號、廟號間徘徊不定。⁴烏蘭著《蒙古源流研究》註解薛禪、完者都（完澤篤）等稱號，說是「蒙古語尊號」，沒有表明是生前尊稱或死後諡號。我的〈元朝帝王錄〉初稿原來也是照錄《元史》各帝紀文，對於「國語尊稱曰」、「國語曰」、「國言廟號曰」、「國言諡號曰」等等不一致的說法，置而不論。姚大力教授的指教，激勵我嚴肅面對問題，一探究竟。

二、紀文疏證

為便利討論，茲將《元史》所見薛禪以迄札牙篤等七個蒙古語稱號的記載臚列如後。《元史》紀文涉及諡號者，亦隨宜依年月先後插入其間。⁵

2 札奇斯欽，《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臺北：聯經，1979），頁3，註3。

3 札奇斯欽，《蒙古黃金史譯註》（臺北：聯經，1979），頁170，註1；頁176，註1。

4 邱樹森主編《元史辭典》（濟南：山東教育，2002）有如下幾條詞目提到蒙古語稱號。〈世祖〉：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上尊諡為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蒙古語尊為薛禪皇帝。」〈武宗〉：「死後廟號武宗，諡仁惠宣孝皇帝，蒙古語尊號曲律皇帝。」〈仁宗〉：「諡號聖文欽孝皇帝，廟號仁宗，蒙古語普顏篤皇帝。」〈英宗〉：「尊諡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蒙古語廟號格堅。」〈明宗〉：天曆二年「八月，文宗即位，諡之曰翼獻景（考）〔孝〕皇帝，蒙語尊號護都篤皇帝，廟號明宗。」〈文宗〉：「廟號文宗，諡聖明元孝皇帝，蒙古語札牙篤皇帝。」詞目〈成宗〉沒提成宗的蒙古語稱號「完澤篤」。

5 引文具從中華書局點校本。倘未特別註明，標點亦從之。引文後括弧內數字標示卷次、頁

1.世祖 薛禪

- A1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癸酉（1294.2.18），世祖卒。
- A2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十四日甲午（1294.5.10），成宗即位。
- A3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十六日丙申（1294.5.12），「中書右丞相完澤及文武百官議上尊諡。」（17：376）
- A4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甲辰（1294.5.20），遣司徒兀都帶、平章政事不忽木、左丞張九思，率百官請諡于南郊。」（17：376）
- A51 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九日「戊午（1294.6.3），遣攝太尉臣兀都帶奉冊上尊諡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國語尊稱曰薛禪皇帝。是日，完澤等議同上先皇后弘吉剌氏尊諡曰昭睿順聖皇后。」（17：376-377）
- A52 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九日「戊午（1294.6.3），遣攝太尉兀都帶奉玉冊玉寶，上大行皇帝尊諡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皇后尊諡曰昭睿順聖皇后，皇考尊諡曰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18：383）
- A6 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乙未（1294.7.10），以世祖、皇后、裕宗諡號播告天下。」（18：385）

2.成宗 完澤篤

- B1 大德十一年正月八日癸酉（1307.2.10），成宗卒。
- B2 大德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甲申（1307.6.21），武宗即位。
- B3 大德十一年六月五日「丁酉（1307.7.4），中書右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左丞相塔剌海言：『……今擬請諡皇考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制曰『可』。」（22：480）
- B41 大德十一年九月四日「乙丑（1307.9.30），請諡皇考皇帝、大行皇帝于南郊，命中書右丞相塔剌海攝太尉行事。」（22：487）
- B42 「是年九月乙丑（1307.9.30），諡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國語曰完澤篤皇帝。」（21：472）
- B5 大德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壬申（1307.10.7），命塔剌海奉玉冊、玉寶，上皇考及大行皇帝尊諡、廟號；又上先元妃弘吉烈氏尊諡，祔于成宗廟室。」（22：487）

3.武宗 曲律

- C1 至大四年正月八日庚辰（1311.1.27），武宗卒。
- C2 至大四年三月十八日庚寅（1311.4.7），仁宗即位。
- C3 至大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乙未（1311.6.11），文武百官也先鐵木兒等上尊諡

曰仁惠宣孝皇帝，廟號武宗。國語曰曲律皇帝。是日，請諡南郊。」(23：531)

- C4 至大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甲子(1311.7.10)，請大行皇帝諡于南郊，上尊諡曰仁惠宣孝皇帝，廟號武宗。」(24：543)

4.仁宗 普顏篤

- D1 延祐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辛丑(1320.3.1)，仁宗卒。
D2 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庚寅(1320.4.19)，英宗即位。
D31 延祐七年五月十七日「乙未(1320.6.23)，請大行皇帝諡于南郊。」(27：602)
D32 延祐七年五月十七日「乙未(1320.6.23)，羣臣上諡曰聖文欽孝皇帝，廟號仁宗，國語曰普顏篤皇帝。」(26：593-594)
D4 延祐七年八月十日「丙辰(1320.9.12)，祔仁宗聖文欽孝皇帝、莊懿慈聖皇后于太廟，鐵木迭兒攝太尉，奉玉冊行事。」(27：605)

5.英宗 格堅

- E1 至治三年八月四日癸亥(1323.9.4)，英宗卒。
E2 至治三年九月四日癸巳(1323.10.4)，泰定帝即位。
E31 泰定元年二月十六日「壬申(1324.3.11)，請上大行皇帝諡于南郊，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29：644)
E32 「泰定元年二月，上尊諡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28：633)
E41 泰定元年四月八日「癸亥(1324.5.1)，以國言上英宗廟號曰格堅皇帝。修佛事於壽昌殿。」(29：646)
E42 泰定元年「四月，上國語廟號曰格堅。」(28：633)

6.明宗 護都篤

- F1 天曆二年正月二十八日丙戌(1329.2.27)，明宗即位。
F2 天曆二年八月六日庚寅(1329.8.30)，明宗卒。
F3 天曆二年八月十五日己亥(1329.9.8)，文宗再即位。
F4 天曆二年十月十三日「丙申(1329.11.4)，中書省臣言：『臣等謹集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院、奎章閣、太常禮儀院、禮部諸臣僚，議上大行皇帝尊諡曰翼獻景孝皇帝，廟號明宗，國言諡號曰護都篤皇帝。』是日，奉玉冊、玉寶于太廟，如常儀。」(33：742)
F5 天曆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乙巳(1330.1.12)，知樞密院事臣也不倫等議請上尊諡曰翼獻景孝皇帝，廟號明宗。」(31：701)
F6 天曆三年三月十八日「己巳(1330.4.6)，議明宗升祔，序于英宗之上，視順宗、成宗遷廟之例。」(34：754)

F71 天曆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壬申（1330.4.9），奉玉冊、玉寶，祔明宗神主于太廟。」（34：754）

F72 天曆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壬申（1330.4.9），祔于太廟。」（31：701）

7. 文宗 札牙篤

G1 至順三年八月十二日己酉（1332.9.2），文宗卒。

G2 至順三年十月四日庚子（1332.10.23），寧宗即位。

G3 至順三年十一月三日「己巳（1332.11.21），詔翰林國史、集賢院、奎章閣學士院集議先皇帝廟號、神主、升祔武宗皇后及改元事。」（37：813）

G4 至順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壬辰（1332.12.14），寧宗卒。

G5 至順四年六月初八日己巳（1333.7.19），順帝即位。

G6 元統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辛亥（1333.12.28）「追諡札牙篤皇帝為聖明元孝皇帝，廟號文宗。」（38：818）

G71 元統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己酉（1334.2.24），太師右丞相伯顏率文武百官等議，上尊諡曰聖明元孝皇帝，廟號文宗，國言諡號曰札牙篤皇帝，請諡于南郊。」（36：806）

G72 元統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己酉（1334.2.24），以上文宗皇帝諡號，遣官告祭于南郊。」（38：819）

G81 元統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己酉（1334.4.25），祔于太廟。」（36：806）

G82 元統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己卯（1334.5.25），奉聖明元孝皇帝神主祔于太廟，躬行告祭之禮……」（38：821）

《元史》記載前述七帝七個蒙古語稱號，形式不一，依序為A51「國語尊稱曰薛禪皇帝」，B42「國語曰完澤篤皇帝」，C3「國語曰曲律皇帝」，D32「國語曰普顏篤皇帝」，E42「國語廟號曰格堅」，F4「國言諡號曰護都篤皇帝」，G71「國言諡號曰札牙篤皇帝」。明言廟號者一（格堅），諡號者二（護都篤、札牙篤）。其言尊稱者一（薛禪），泛言國語曰者三（完澤篤、曲律、普顏篤），雖未明白說是諡號或廟號，但四者全部緊隨在漢語諡號、廟號之後出現，所以，《元史》諸帝紀的編纂者顯然是以蒙古語諡號、廟號視之。如若不然，所有七個蒙古語稱號，應如漢語尊號般，上於該帝在位之時，見諸該帝本紀或前、或中、或後的相應位置，絕不會等到該帝本紀進入尾聲、即將落幕的一刻才來記上一筆。⁶總之，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除太祖稱號成吉思汗外，《元史》編纂者是不把它們當做生前的尊稱看待的。他們或視

6 明宗國語稱號見〈文宗紀二〉（F4），其餘諸帝國語稱號具見各帝本紀末。

之爲諡號，或視之爲廟號，兩者固有分別，卻都是死後才得到的。

前引四十六條《元史》紀文，係依所繫月日先後排列。細繹其內容，可知《元史》編纂者對於前述蒙古語稱號的性質（謂生前尊稱或死後諡號或廟號之類），固不甚了了，他們對於漢語諡號、廟號的相關記載，其實也不乏矛盾、籠統、混亂。釐清這些現象，對於我們確定蒙古語稱號的性質，或有幫助。

解決元朝皇帝國語稱號的性質問題，莫若把元代文獻載有這類稱號者提出來檢驗。倘若這類稱號已見用於各該皇帝生前，則這類稱號無疑就是各該皇帝在位之時已經有之的尊稱，而非死後方才獲得的廟號（或諡號）。具體的說，假如薛禪稱號在世祖生前的文獻中已有所見，我們就可以肯定薛禪的確是尊稱。如其不然，我們只好存疑，讓兩說繼續共存並立。

元代文獻載有元帝國語稱號者不少。其中以稱號的主人——謂如稱號薛禪的主人爲世祖——已死之後才形成的文獻居大多數。這類文獻不必檢驗，因爲，舉例而言，仁宗時代的文獻出現世祖稱號薛禪對我們判斷薛禪究竟是尊稱或廟號並無助益，蓋此時尊稱或廟號皆可使用故也。唯有世祖時代的文獻出現薛禪，方可斷定薛禪爲尊稱。這是我們尋找的標的。還有一類文獻，譬如說，武宗時代的文獻，轉引世祖時代的紀事，出現「薛禪」兩字，而我們很難證明原始記載就有這兩字；我們不排除它是出諸後人的追加。這類文獻，姑名之曰備攷文獻，我將斟酌提出來討論。⁷

以下謹依元帝世次，以國語稱號問題爲核心，對前揭紀文及其他相關記載，檢討如下。

綜觀前揭紀文，可知新帝即位後，給予大行皇帝以諡號，有一套固定的程序。首先是百官集議，討論諡號的文字，可稱爲議諡。議定後，奏請皇帝裁定，可稱爲定諡。定諡後，擇日告祭于南郊（意即請示於長生天），可稱爲請諡。請諡後，擇日遣官奉玉冊、玉寶奉上尊諡，可稱爲上諡。議、定、請、上諡號之時，同步處理廟號。這是標準程序。茲以前揭紀文爲限，舉例

7 明顯爲後人追補改訂者不舉。例如釋祥邁撰《大元至元辨僞錄》（臺北：新文豐，1991，《新編縮本乾隆大藏經》第146冊）卷3過錄憲宗「戊午年（1258）七月十五日」忽必烈大王令旨，開頭「長生天底氣力裏，蒙哥皇帝福廕裏，薛禪皇帝潛龍時令旨」內（頁386-387），「薛禪皇帝潛龍時」云云，其爲後人追改，顯然可知。

以明之。如文宗 G3「集議先皇帝廟號」，議也；G6「追諡……廟號文宗」，定也；G71「請諡于南郊」、G72「告祭于南郊」，請也；G81「祔于太廟」，上也。假如這幾條紀文，我的解讀正確無誤，那麼，文宗諡號由議而定、由請而上的四道程序，可謂有幸具皆見諸記載。其他幾位皇帝，則有或多或少的省略，如仁宗和英宗的議諡部分即不見於紀文。這對於我們的討論，影響不大，可以不論。應當注意的是錯誤以及矛盾的記載。

（一）世祖 薛禪

請從世祖說起。據 A51，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九日，兀都帶奉冊上世祖尊諡。就在這一天，「完澤等議同上先皇后弘吉刺氏尊諡曰昭睿順聖皇后。」這是議諡。但是，據 A52，是兀都帶上諡，不是完澤議諡。其中必有蹊蹺。我以爲 A52 是對的，A51 的記載有問題。

今按《元史》本紀，係據各朝《實錄》而編，而各朝《實錄》，係據《時政篇》或《起居注》之類的材料纂成。⁸《時政篇》或《起居注》，以事繫日，逐日記錄，最爲詳實可信。A51、A52 兩條繫同一日，彼時世祖已卒，成宗在位，該日發生諸事應是載在成宗的《起居注》。成宗《起居注》內是日條下應有兀都帶上昭睿皇后尊諡之記載。這一記載後來纂入《成宗實錄》，再由《成宗實錄》過錄到《元史》〈成宗本紀〉的相應位置。另一方面，理論上，世祖的《起居注》在他逝世之日即已告成，即使把世祖死後、成宗即位前這一段無君月日發生的事，都記錄在世祖的《起居注》，世祖的《起居注》應當沒有奉上尊諡於昭睿皇后的記載，因爲當時世祖已卒兩個月又半，成宗在位已經二十五日，斷無把當今皇上在位之時發生的事記錄在大行皇帝的《起居注》之理。職是之故，我認爲《元史》〈世祖本紀〉前揭 A51 條紀文，「是日」之後的記事，應係來自《世祖實錄》，而《世祖實錄》該條記載，則係轉錄自成宗的《起居注》。至若「是日」之前，除開「國語尊稱曰薛禪皇帝」這幾個字，其餘詞句，自「戊午」以迄「廟號世祖」云云，更不待言，最早也是見之於成宗的《起居注》的。比較 A51、A52 兩條紀文，顯然可見，兩者原始來源相同，都是成宗的《起居注》，其源流始末，可以簡單說是：由成宗《起居注》而《世祖實錄》而《元史》〈世祖本紀〉A51 條紀文；由成宗

8 參看王愼榮、葉幼泉、王斌，《元史探源》（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頁 40-42。

《起居注》而《成宗實錄》而《元史》〈成宗本紀〉A52條紀文。爲行文之便，姑且把A51、A52紀文的形成過程分別名之曰「轉錄」和「直錄」。直錄的A52條沒有「國語尊稱曰薛禪皇帝」這幾個字，轉錄的A51條則有之。這是否意味著這幾個字原非成宗《起居注》所有，而係後來編纂世祖《實錄》或《本紀》之時所補入？緊隨其後出現「是日」兩字，讓我益發覺得這幾個字以及「是日」兩字，都是出於該一編纂者的增補。倘如我們把「國語尊稱曰薛禪皇帝」云云刪掉，那麼，「是日」兩字讀來即成累贅。我以爲正是因爲補入了「國語尊稱曰薛禪皇帝」這幾個字，於是乎隨即補上「是日」兩字，以維護文句的順暢。至於A51條「是日」後記完澤「議」尊諡，A52條則記爲兀都帶「上」尊諡，我以爲前者誤而後者是對的。一方面，我尚未發現A51條所謂完澤「議」昭睿順聖皇后尊諡的其他佐證。⁹另一方面，A52條謂世祖、昭睿、裕宗同日上諡，則是另有史料可以爲證。文廷式自《永樂大典》抄出的世祖與裕宗諡冊文皆繫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九日戊午。¹⁰張伯淳撰〈免差稅詔〉內，有「迺者恭惟世祖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請諡於南郊，奉冊於太室」云云，可證三人同日上諡。¹¹A51條「是日」後的記載的確錯了。最後必須指出，王構撰〈世祖皇帝諡冊文〉內，有曰：「謹遣攝太尉臣兀都帶奉冊寶，上尊諡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全文無一語涉及世祖的國語稱號。這條資料提供另外一個證據，證明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九日這一天，上的是漢語諡號和廟號。前揭A51條〈世祖紀〉文的寫法，直讓人以爲世祖的國語「尊稱」薛禪也是上於這一天。即使我們把點校本《元史》在「廟號世祖」與「國語尊稱曰薛禪皇帝」之間的逗號改爲句號，依然語涉曖昧，也相當彘手。我推測，A51條〈世祖紀〉文的執筆者大概知道世祖有一國語尊稱曰「薛禪皇帝」，惟因不知上於何時，

-
- 9 《元史》卷130〈完澤傳〉謂：至元「三十一年世祖崩，……建議加上祖宗尊諡廟號，致養皇太后……」（頁3174）泛言祖宗，沒有特別指名昭睿順聖皇后。
- 10 文廷式自《永樂大典》卷13151、13152抄出以下諸帝〈諡議〉及〈諡冊文〉：太祖、睿宗、世祖、裕宗、顯宗、順宗、成宗、武宗、仁宗、英宗；見《純常子枝語》（朱印本，1943），卷38，頁1a-18b。（《純常子枝語》載有元帝諡議文字，係惠蒙業師蕭啓慶院士示知，謹此誌謝。）張伯淳《養蒙先生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元代珍本文集彙刊》本）卷1〈裕宗冊文〉（頁39-41），繫年而無月日，文氏所輯則年月日並見。
- 11 張伯淳，《養蒙先生文集》卷1，頁42-43。

故無法在〈世祖本紀〉的相應位置加以敘述，於是就在〈世祖本紀〉結尾說到他的漢語諡號和廟號之後，順便帶上一筆，交代了事。¹²

元代文獻載有薛禪稱號者屢見不一，惟無一件可確定是寫於世祖時代者。至於可稱為備攷文獻者有二，具見順帝至正初成書的《秘書監志》。一曰：「至大元年四月初十日，秘書少監苦思丁除制前歷仕外，至元二十二年有扎馬刺丁引現過，奉薛禪皇帝聖旨……」；二曰：「至元二十六年，有扎馬刺丁奏奉薛禪皇帝聖旨……」。¹³我無法確定「薛禪」兩字是後人的追加，或是當年（至元二十二、二十六年）文獻已有。總之，《元史》紀文提到世祖漢語廟號及國語稱號的那條記載（A51）有問題。其執筆者究竟相信「尊稱」薛禪是世祖死後的追贈，或我們誤讀這條紀文？缺乏明確證據來論斷。

（二）成宗 完澤篤

次說成宗。據B42，大德十一年九月四日，上諡。但是據B41，是請諡，非上諡。再者，據B5，上諡日期是九月十一日，非九月四日。假如B41、B5兩條紀文所載是實，那麼B42紀文也就犯了牛頭不對馬嘴之誤。

按B41及B5兩條關於請諡及上諡紀文，以及張士觀撰〈成宗皇帝諡冊文〉，¹⁴只言及成宗的漢語諡號和廟號，而無一語及其國語稱號，應可推定，稱號完澤篤的出現，時間上應與漢語諡號、廟號的出現時間不同。換言之，B42條「國語曰完澤篤皇帝」諸字，疑是撰文者的追加。若然，則稱號完澤篤非是上於成宗死後，應為生前既已有之的尊稱。惟我們既無當代文獻為證，亦無備攷文獻以供討論。今蒙姚大力教授指示，查得波斯史料《史集》內的兩條記載或可證明完澤篤確為成宗生前的尊稱。

按《史集》（*Jami' al-Tawarikh*）乃波斯伊利汗國宰相、史學家拉施特丁（Rashid ad-Din, 1247-1318）奉伊利汗合贊（1295-1304）、完者都（1304-1316）敕撰的世界通史。全書三部，完成於1310-1311年間。全書〈總序〉

12 王慎榮等《元史探源》說：「我們認為，《本紀》是原原本本過錄自《實錄》的。對於每位皇帝在即位之前所有關於他的生平簡介和後面的幾句結語才是修《元史》的史臣們很可能是宋濂或王禕的手筆。」（頁43）我同意這個看法。

13 元王士點、商企翁編次，今人高榮盛點校，《秘書監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元代史料叢刊》本），卷1，頁32。

14 蘇天爵輯，《國朝文類》（《四部叢刊》本）卷10，頁10下-11上。亦見《純常子枝語》。

後〈目錄〉載：「鐵穆耳合汗紀。他是忽必烈合罕的孫子，爲當今合罕；享年……，在位……」¹⁵文中稱鐵穆耳爲「當今合罕」，按成宗鐵穆耳卒於1307年2月10日，故可推知該條目錄應寫於此前。查《史集》第一部《蒙古史》內，〈鐵穆耳合汗紀〉中曰：「鐵穆耳合汗，又名完澤篤合罕……」。¹⁶

按《史集》第一部《蒙古史》首先完成，時1307年。據此可知，拉施特丁寫下前揭兩條引文之時，成宗鐵穆耳尚在位，而拉施特丁且知他又叫做完澤篤合罕。除非我們能證明引文中「又名完澤篤合罕」云云，是後來的追加補筆，否則，我們應當相信，完澤篤合罕是成宗生前已有的尊稱。前揭B42條《元史》紀文，也就是〈成宗紀〉結尾那段話，讀來讓人以爲成宗既死之後，於1307年9月30日，始才獲得廟號完澤篤，並非實錄。

（三）武宗 曲律

次說武宗。C3條的文字含糊不清。「也先鐵木兒等上尊諡曰」云云，若係記上諡，則因下文又有「是日，請諡南郊」云云，故有先上後請，違反常理之嫌。今持武宗C3條比對文宗G71條，文字、句式如一，而綜合觀察文宗諡號相關諸條紀文，可知G71條係記請諡事，故C3條所記亦係請諡事，前文「也先鐵木兒等上尊諡曰」云云，略記議諡完了，奏請定諡也。果然如此，我們固然化解了先前對C3條直覺上先上後請的錯誤解讀，但是，C3的問題並沒有全了。據C4條，請諡在六月二十四日，C3條則繫於五月二十四日。我推測，五月二十四日定諡，六月二十四日請諡完畢，隨即上諡。總之，C3條語意曖昧之外，尚有月日錯置的問題。

按問題重重的C3條見於〈武宗紀〉，從史源學的觀點言，用我權宜的話說，並非直錄，而是轉錄。轉錄過程中稍一疏忽，就會出錯。直錄的C4條沒有提到「曲律」，轉錄的C3條則有之，顯然是出自撰文者的增補。按今傳元朝皇帝的諡冊文，對於他們的國語稱號，片言隻字，一無所及。武宗的諡冊文，也不例外。¹⁷C3條紀文所以增補「國語曰曲律」云云，其理由應與世祖A51條增補「國語尊稱曰薛禪皇帝」云云無異。就是說，增補者知有曲律稱號，但不知應置於〈武宗紀〉何處，故權宜追記於紀末漢語廟號後，卻未遑

15 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1卷第1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頁99。

16 同上註，第2卷，頁374。

17 武宗的諡冊文，見前揭《純常子枝語》，卷38，頁14下。

對照相關記載，攷其是非，訂其訛誤，以致文意晦澀，多所牴牾。

武宗皇帝有兩條史料應該提出來討論。其一，《永樂大典》卷19420引文宗至順二年（1331）成書的《經世大典》內〈站赤〉篇的一段記載如下：

〔至大〕四年二月六日。通政院察乃、朶年等啓於皇太后、皇太子曰：「完澤篤皇帝暨曲律皇帝登寶位時，各處使臣有營己私事，託言進鷹來者，合無禁約。」¹⁸

按武宗卒於至大四年正月八日（1311.1.27）。他的漢語諡號，據前文推測，五月二十四日定諡（C3），六月二十四日請諡並上諡（C4）。他的國語稱號曲律，前引C3條〈武宗紀〉文，置「廟號武宗」後，繫五月二十四日。〈站赤〉本條，繫二月六日，不會有錯，已見稱號曲律。¹⁹假如〈站赤〉本條的原始來源已用「曲律」兩字，則國語稱號曲律比漢語廟號武宗已早出現三個多月。果然如此，我們即可更進一步推測說，C3條〈武宗紀〉文的撰文者，也許真以為武宗、曲律二號皆定於同時，也許他知道稱號曲律出現在先、廟號武宗在後，但不知把曲律安排在紀中何處，故權宜在「廟號武宗」後加上一筆，以致引人誤解。究竟如何，已不可知。重要的是，〈站赤〉本條原始來源究竟是否已用「曲律」兩字呢？這其實同樣難答。今按條中引察乃、朶年、皇太后、皇太子的話，無疑係由蒙古語轉譯為漢語，並已由通俗硬譯潤飾成書面漢文。對去世多年的成宗和新近云亡的武宗，察乃等人如何稱呼呢？我認為直呼名諱，稱為鐵穆耳可汗、海山可汗的可能性極低（詳後〈上位名字〉）。稱其漢語廟號成宗的可能性也極低，因為蒙古、色目人如此稱呼蒙古皇帝彆扭聲口且不倫不類，何況武宗廟號此時尚且未定。成宗的國語稱號完澤篤，不論是生前既已有之的尊稱，或者是死後方才獲得的廟號，這時都已行之有年，察乃等人稱之為完澤篤可汗（Öljeitü Qayan）應是自然而然的事。由「可汗」而「皇帝」，應是由音譯而意譯的改變。條中曲律皇帝，亦應譯自Külüg Qayan，即察乃等人對剛死不久的皇帝的稱呼。換言之，我頗疑武宗在世之時已有尊稱曰「曲律可汗」。或謂稱號曲律也有可能在武宗於至大四年正月八日卒後不久追贈，故二月六日公文書中得見此稱號。但我以

18 《永樂大典》卷19420，頁7上。

19 《永樂大典》〈站赤〉諸條文排列，具按年月先後，本條之前一條繫至大三年十一月，後一條繫至大四年三月十三日，故知本條繫日無誤也。

爲對大行皇帝追贈稱號係朝廷大事，而此時皇位仍然虛懸，權治國事的仁宗仍然爲皇太子，以皇太子身分追贈稱號給大行皇帝，似不合倫理、不合體制，故謂稱號曲律係武宗卒後不久所追贈，甚不可能。

武宗皇帝另一史料見於《元典章》〈僧道簪剃給據〉條，²⁰文曰：

至大四年四月□日，福建宣慰司：

承奉江浙行省劄付：

准中書省咨：

至大四年二月初九日（1311.2.27），啓過事內一件：

在前，曲律皇帝時分，宣政院官人每奏了：「江南有頭髮的行者，交披剃爲僧者。」麼道，欲待開聖旨去的其間，前中書省官人每奏了：「完澤篤皇帝時分，待做和尚的，他每替頭裏若有當差的，侍養父母的弟兄孩兒每呵，本處官司明白給據，執照文字，交做和尚來。……」

按《元史》〈仁宗紀〉：至大四年二月「辛亥（九日，1311.2.27）……禁宣政院違制度僧。」《典章》與《元史》二者所載爲一事。《典章》繫日至大四年二月初九日應無問題。中書省官啓稟皇太子——實即故君武宗之弟，即將於三月十八日即位的仁宗——之時，以曲律可汗稱呼武宗，如前所論，乃自然之事。前揭《經世大典》〈站赤〉以及《元典章》〈僧道簪剃給據〉兩條文內「曲律皇帝」，推測都是 Kūlüg Qayan 的音譯兼意譯。除了 Kūlüg Qayan 之外，中書省官對於一個月前逝世的皇帝，恐無更爲適當的稱呼。縱使有之，兩條文的翻譯者亦無必要把它改爲「曲律皇帝」。再者，《元典章》〈僧道簪剃給據〉條內兩個日期——至大四年二月九日，以及同年四月——都早於前揭 C3 條〈武宗紀〉文所繫的五月九日。該一〈武宗紀〉文的寫法有誤導讀者以爲曲律稱號要到是年五月九日方才出現之嫌。

（四）仁宗 普顏篤

次說仁宗。就漢語諡號、廟號言，D32 條的記載沒有問題。但若以爲稱號普顏篤亦係延祐七年五月十七日方才上給仁宗的國語廟號，則有商榷之餘地。按仁宗的諡冊文，亦爲張士觀所撰，也不見稱號普顏篤，推測 D32 條「國語曰普顏篤皇帝」諸字，也是撰文者的追加。

20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臺北：故宮博物院，1972，景元刻本），卷33，頁4上-4下。姚大力教授賜教信中提及這條資料，謹此再致謝忱。

仁宗有一條史料，可與前揭武宗的兩條史料齊觀。《永樂大典》卷2608引順帝重紀至元二年（1336）成書的《憲臺通紀》內，有件文書題曰〈御史臺復陞從一品〉，云：

延祐七年四月十四日（1320.5.22），本臺官奏：

俺與廣平王脫秃哈大夫一處商量的奏有。近間，爲衙門冗濫，驟陞品職的，交減降有。御史臺元是二品有來。曲律皇帝聖旨、普顏篤皇帝潛邸聖旨……²¹

延祐七年四月十四日，武宗已卒將近十年，御史臺官稱他爲曲律皇帝，不論曲律爲尊稱，爲廟號，都是可以的。稱仁宗爲普顏篤皇帝，則值得注意。按仁宗卒於延祐七年正月二十一日；據《元史》紀文（D32），他的漢語廟號仁宗及國語稱號普顏篤，五月十七日所定，但本件文書繫四月十四日，已見稱號普顏篤。我沒有理由相信，除了Buyantu Qayan之外，臺官當時還能怎麼稱呼他；我也沒有理由相信，「普顏篤皇帝」云云，出諸後人——譯者也罷、編者也罷——的追補改寫。

（五）英宗 格根

次說英宗。按記錄英宗漢語諡號及國語稱號的幾條紀文，彼此並無矛盾。惟有一特殊處，值得注意。據E31、E32兩條，英宗的漢語諡號、廟號上於泰定元年二月；據E41、E42兩條，他的「國言廟號」上於同年四月。先漢語、後蒙語，英宗與泰定兩帝紀皆如是說。而其他諸帝的漢語諡號、廟號，與他們的國語稱號，據前揭紀文，則皆上於同月同日。英宗是例外。這一例外，對鄙人尙無所啓示。

《元史》紀文關於英宗漢語廟號的記載並無問題。問題在於E41和E42兩條有關國語廟號的記載。具體的說，這兩條紀文的確切意涵以及所載是否合乎事實，我們難以了然於心。我們也無法明白英宗漢語廟號先上、國語廟號後上，如果這是事實的話，原因究竟何在。

按E41和E42兩條，其實一也，只不過一說「以國言上英宗廟號曰格堅皇帝」，一說「上國語廟號曰格堅」，字句稍異而已。「上廟號曰格堅」云云，按照字面意義，意謂由「議」至「上」廟號的最後一個程序的完了。這是毋庸置疑的。問題是，這種句子，往往引人聯想，以爲「格堅」一詞，原

21 洪金富點校，《元代臺憲文書匯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頁70。

與英宗並無牽連，直到英宗已死之後，因為被選為英宗的國語廟號，才與英宗發生聯繫。但是，如此理解，這般演繹，是否正確，我不敢必。

格堅如果確實是泰定元年四月方才選為英宗的國語廟號，那麼，對尊稱說者來說，這無疑是一次重擊。不僅此也，尊稱說者還得面對泰定帝登極詔中不利於己的證據。按英宗於至治三年八月四日南坡遇弒之後，幕後主謀這次血腥政變的英宗堂伯父也孫鐵木兒即位於漠北龍居河畔，是為泰定帝。著名的泰定帝即位詔提到這位短命的皇帝，直呼其名，或曰「姪碩德八剌皇帝」，或曰「姪皇帝」，看不到他有甚麼國語稱號。²²泰定帝即位詔頒布於至治三年九月四日；前揭《元史》紀文謂英宗的國語廟號格堅上於次年（泰定元年）四月八日。詔、紀史料對於尊稱說而言，甚為不利。攷英宗在位將近三年半，羣臣曾上他漢語尊號，曰「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他且因此而詔天下、謝太廟。²³他既有漢語尊號，治世三年又半，當間果真沒有羣臣給他國語尊稱，以致繼立的泰定帝只好稱他的名，稱他姪皇帝？假如英宗治世之時果然沒有國語尊稱，那麼，泰定帝即位後第一百六十九天，何故要追送給已遭他殺害的政敵一個意為「光明」、意為「英明」的廟號？廟號格堅又何以在廟號英宗已上之後五十多天才上？連串問題，頗費猜疑。²⁴

22 茲錄《元史》卷29〈泰定帝紀一〉所載該一詔書部分文字如下：「薛禪皇帝可憐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我仁慈甘麻刺爺根底，封授晉王，統領成吉思皇帝四個大幹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都付來。依著薛禪皇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人民的不揀甚麼勾當裏，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在後，完澤篤皇帝教我繼承位次，大幹耳朵裏委付了來。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著，扶立了兩個哥哥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姪碩德八剌皇帝。……今我的姪皇帝（生）〔升〕天了也……」（頁638）

23 《元史》，卷27〈英宗紀一〉，至治元年十一月戊寅、己卯、庚寅條，頁614。

24 有幾個不成熟的想法，略記於此。

1. 我們是否可以設想，英宗在世之時，原已有「格堅」的稱號，因為某種緣故，在他死後，他的神主牌位，寫的竟然是不久前才議定的漢語諡號和廟號，曰：「英宗睿聖文孝皇帝」，獨獨缺少蒙古語的廟號，故五十多天之後，因為某種緣故，才把他在世之時的尊稱補在他的神主牌位上（或者說補上一塊國語牌位），於是史官才記載說「上廟號曰格堅」？

2. 按泰定帝即位於1323.10.4（年.月.日），請漢語廟號英宗於1324.3.11（E31），距泰定即位118天；上國語「廟號」格堅於1324.5.1（E41），距泰定即位169天。攷元朝制度，新帝即位後，對前任皇帝，例有追諡（泰定帝除外）。追諡有議、定、請、上的固定程序，已見前述。元朝皇帝的追諡記載，甚為闕漏，且多含糊。今以《元史》〈本紀〉相關記載為限，不論是議、是定、是請、是上，皆取其最早的一個日期，計算該一日期上溯至新帝即位之日的日數，世祖3天，成宗14天，武宗66天，仁宗66天，英宗118天（漢語）、169

(六) 明宗 護都篤

次說明宗。²⁵按F4條內，中書省臣集諸臣僚「議上大行皇帝尊諡」云云，記定諡也；後面「奉玉冊、玉寶于太廟」云云，記上諡也。定上之間的請諡，本條未載，或因請諡一事，實未曾舉行，或因確有請諡事，而史文刪略不書，或者另有原因，已難攷實。無論如何，本條繫定、上於天曆二年十月十三日這一天，與後列諸條不合。按F5條，「也不倫等議請上尊諡曰」云云，記定諡也，繫天曆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同記定諡也，而繫日不同，F4與F5，必有一誤。至於上諡，據F4條，與定諡同日，即天曆二年十月十三日，據F71及F72條，則為天曆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我以後者為正確，因為據F6，明宗神主的位次直到三月十八日才決定。位次定，才能上諡祔廟。

F4條所謂「國言諡號曰護都篤皇帝」云云，也有問題。除了本條紀文之外，我們別無史料以護都篤為諡號。虞集撰〈明宗皇帝祔廟冊文〉²⁶只載明宗的漢語諡號和廟號，不見所謂的國言諡號，足證護都篤即使為諡號，恐亦非定於同時。因此，我推測F4條紀文原本就是將有關明宗諡號之原始記載雜揉而成的，剪裁之時，沒有注意到原始記載中事與日的配合，以致張冠李戴，牴觸它處的記載。至於「國言諡號曰護都篤皇帝」云云，應係撰文者的

天（國語），明宗58天，文宗30天（新帝寧宗）及126天（新帝順帝）。純就數字而論，泰定帝諡英宗，給人拖拉的感覺。這又是為甚麼？

3.順帝即位後第126天，才給已死483天之久的文宗定下廟號，又過了58天才祔廟（G81），六年半後，重紀至元六年六月，卻又以文宗「謀為不軌，明宗飲恨而終」，除去文宗的廟主。較之其他皇帝，泰定、順帝兩人都是即位很久以後才給先帝立諡立廟。泰定帝是殺害英宗的主謀，順帝之父明宗慘遭同父異母弟文宗的毒手。先帝英宗，對泰定而言，是政敵；先帝文宗，對順帝而言，是仇人。泰定、順帝兩人在處理先帝的廟祀問題上，異乎其他的幾位皇帝，值得重視。

- 25 英宗之後，泰定繼為皇帝四年有餘，既死之後，其子阿剌吉八即位於上都，是為天順帝。另一方面，武宗之子圖帖睦爾則即位於大都，是為文宗。二帝相爭，上都兵敗，天順帝不知所終。文宗旋即讓位於異母兄和世㻋，是為明宗。明宗自和林南下，未入中國而暴卒，文宗復即帝位。文宗不為泰定帝立廟，我們可以理解。泰定帝在位之時，羣臣曾議上尊號，據說因為翰林承旨劉廣「抗言其不可，事遂已。」（《元史》，卷174〈劉廣傳〉，頁4063。）這段記載說的可能是漢語尊號。至於國語尊號，推測是有的，只因不見於漢文記載如《泰定帝實錄》等，以致明初史臣無所依據，不得補入《元史》之中。

- 26 虞集，《道園學古錄》（《四部叢刊》本）卷21，頁1下-2上；《國朝文類》卷10，頁13下-14上。

補入。其所以補入於此，與前揭世祖 A51、武宗 C3 條補記薛禪、曲律稱號於相應位置，應無不同。又，A51 以薛禪為國語尊稱；C3 條泛曰國語，以上下文意度之，疑以為廟號；明宗本條則以護都篤為諡號。諸條紀文對國語稱號的性質，認定不同，其中緣故，實難發明。有個推測，請詳第三節。

（七）文宗 札牙篤

最後說文宗。G3 以下諸條紀文，乍看之下，似有矛盾，其實不難解。G3 條記寧宗下詔議諡，未果而寧宗卒（G4）。順帝繼位（G5）後，始定諡為聖明元孝皇帝，廟號文宗（G6）。我說定諡，因為 G6 條中「追諡」一語意謂已議定諡號文字，非謂該日上諡號也。諡號既經議定，下一步即是請諡。G71 及 G72 兩條紀文中，雖有「……議，上尊諡……」及「以上……諡號……」字樣，說的並非議諡及上諡。重點在文末所謂「請諡于南郊」及「遣官告祭于南郊」。換言之，這兩段紀文（一見〈文宗紀〉，一見〈順帝紀〉）所記是同一事，即請諡。請諡之後是上諡，祔于太廟（G81）。²⁷

文宗 G6、G71 兩條，對於我們論證元朝皇帝國語稱號的性質，很有啓示作用。按 G6 條記定諡事；G71 條則記請諡事，G72 條可以為證。G6 條「追諡札牙篤皇帝為聖明元孝皇帝，廟號文宗」云云，足證元統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辛亥定號文宗之前，札牙篤的稱號已經存在。定諡之前既已有之，請諡之時更不待言。倘無 G6 條「追諡札牙篤皇帝」云云的說法的啓示，文宗 G71 條內「國言諡號曰札牙篤皇帝」云云，我們恐怕又要直覺以為札牙篤的稱號，要到這個時候方才出現。文宗之前，世祖、成宗、武宗、仁宗、明宗諸帝，英宗除外，他們的國語稱號在《元史》〈本紀〉內都只出現一次，而且都是出現在各該帝「諡曰某某皇帝，廟號某祖某宗」的記載之後。所以，這些稱號，不論稱之曰尊稱，或曰諡號，或曰廟號，或泛曰國語，讀來不免要覺得那是給予先帝的，他們生前既無所知的國語廟號或諡號。G6 條證明文宗定諡之前已有札牙篤的稱號，那麼，所謂之前，究竟可以上溯到何時呢？

今查《元史》所載寧宗、順帝兩即位詔書皆已見此稱號（寧宗詔作扎），則此稱號在至順三年十月四日寧宗即位之前應已有之。²⁸惟我們仍未能發現

27 文宗神主祔太廟日期，文宗、順帝兩帝紀所載（G81、G82）異。

28 《元史》卷 37〈寧宗紀〉載其即位詔書，稱「扎牙篤皇帝」者三。（頁 810）卷 38〈順帝紀

文宗在世之時已稱札牙篤皇帝的具體實例。雖然如此，寧、順二帝即位詔書，連同前揭G72條紀文，對於澄清G71條紀文的實際涵意，有所助益。

總結本節的討論，可以歸納為數點如下：

第一、《元史》〈本紀〉記元朝皇帝有蒙古語稱號者八人。除太祖稱號成吉思汗明確說是生前的尊稱外，其餘七人的稱號，《元史》〈本紀〉的編寫者顯然視之為死後的諡號或廟號，而且，除英宗外，其餘六人的國語諡號或廟號，皆與他們的漢語廟號同日追贈。

第二、《元史》那幾條紀文，關於漢語廟號的記載，存在不少錯誤。這類錯誤，蓋因過錄原始資料不及細攷所致。同條紀文內記載漢語廟號既有錯誤，記載國語稱號難保沒有問題。我懷疑諸條紀文的編寫者或許知道那些國語稱號是各該皇帝生前的尊稱，惟因不知應繫某年月日條下，故權宜附記在紀末漢語廟號記述之後，卻不加註說明，以致我們有所誤解。²⁹

第三、解決元帝國語稱號究竟是皇帝生前既已得之的尊稱或是死後方才獲得的廟號或諡號，莫若舉出具體例證。就蒙漢文獻而言，我們迄今並未發現以國語稱號稱呼當時在位的皇帝的任何記載。換言之，除稱號成吉思汗確為生前尊稱外，其他稱號是否為尊稱，並無確鑿的證據。但我們卻有幾條資料可以證明曲律、普顏篤、札牙篤等三個稱號出現的時間，要比武宗、仁宗、文宗三帝本紀末尾所給的時間來得早。具體說，據《元史》〈武宗紀〉，曲律稱號定於至大四年五月二十四日（1311.6.11）；但是，《經世大典》〈站赤〉及《元典章》各有一條史料可以證明二月六日（1311.2.24）、二月九日已見稱號曲律。又，據《元史》〈仁宗紀〉，普顏篤稱號定於延祐七年五月十七日（1320.6.23）；但是，《憲臺通紀》有一條史料可以證明四月十四日（1320.5.22）已見稱號普顏篤。又，據《元史》〈文宗紀〉，以札牙篤稱號請於南郊的日期是元統二年正月二十一日（1334.2.24）；但是，《元史》〈寧宗紀〉載至順三年十月四日（1332.10.23）寧宗即位詔已見稱號札牙篤；《元史》〈順帝紀〉載至順四年六月八日（1333.7.19）順帝即位詔已見稱號札牙篤；《元史》〈順帝紀〉元統元年正月二十一日（1333.12.28）條復見稱號札牙篤。凡此種種，雖不能積極支持尊稱說，卻是對廟號說極為不利的，因

一〉載其即位詔書，稱「札牙篤皇帝」者四。（頁816）

29 明宗國語稱號，不見〈明宗紀〉，見〈文宗紀〉，餘六帝均見各帝本紀。

爲它們證明《元史》相關紀文的記載很有問題。

第四、波斯史家拉施特丁《史集》第一部《蒙古史》內〈鐵穆耳合罕紀〉，據信係完成於鐵穆耳合罕即成宗在位時期，紀中說鐵穆耳合罕「又名完澤篤合罕」；但是，據《元史》〈成宗紀〉，完澤篤稱號首見於大德十一年九月四日（1307.9.30），時成宗已卒七個多月。《史集》〈鐵穆耳合罕紀〉是唯一可以支持尊稱說的文獻，除了成吉思汗的記載之外。否定尊稱說，必須證明〈鐵穆耳合罕紀〉的記載有問題。但是，這似乎是不可能的。

三、《輟耕錄》之說

元末明初浙江天台人陶宗儀（約1316年生，1401年後卒），這位熟悉元朝典故的學者，在元亡前夕著成《輟耕錄》一書（順帝二十六年，1366，孫大雅序）。卷1首爲〈大元宗室世系〉，次爲〈列聖授受正統〉。〈列聖授受正統〉記始祖、烈祖、太祖以迄「今上皇帝」即順帝等元朝皇帝的名諱廟號、生卒年壽、紀元年號等。他也記錄了「薛禪」之類的蒙古語稱號如下：

太祖應天啓運聖武皇帝，諱鐵木真。國語曰成吉思。

太宗英文皇帝諱窩闊台。……定宗簡平皇帝諱貴由。……憲宗桓肅皇帝諱蒙哥。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諱忽必烈。國語曰薛禪。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諱鐵木耳。國語曰完者篤。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諱海山。國語曰曲律。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諱愛育黎拔力八達。國語曰普顏篤。

英宗睿聖文孝皇帝，諱碩德八剌。國語曰革堅。

明宗翼獻景孝皇帝，諱和世剌。國語曰忽都篤。

文宗聖明元孝皇帝，諱圖脫木兒。國語曰扎牙篤。

寧宗冲聖嗣孝皇帝，諱懿璘質班。

今上皇帝，御名妥歡帖睦爾。……元統二、至元六，至正今二十六年。³⁰

前引諸帝條文，首漢語廟號、次漢語諡號、次國語名諱、次國語曰，先後有序，井然不變。惟成吉思、薛禪等蒙古語稱號，陶九成一概以「國語曰」

30 陶宗儀著，文灝點校，《南村輟耕錄》（北京：文化藝術，1998），卷1，頁10-12。

三字冠其上，今日讀來，殊覺朦朧，蓋我們很難了解所謂「國語曰」的明確意涵。推測「國語曰」云云，可能含義不外乎四：一名諱、二廟號、三諡號、四尊稱。今按太祖諱鐵木真而非成吉思，世祖諱忽必烈而非薛禪，史書具在，可以覆驗，且〈列聖授受正統〉內「國語曰」之前既載該帝國語名諱，則「國語曰」之後的國語稱號，斷非諸帝名諱，這是毫無疑問的。其次，按「鐵木真」是元太祖的名諱，「成吉思汗」是他的尊稱，1206年斡難河源即位之時諸王羣臣所共上。這是人盡皆知的事。所以，陶九成所謂「國語曰成吉思」云云，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國語尊稱曰成吉思」。但是，我們可以援引太祖之例，推及後來諸帝，說世祖「國語尊稱曰薛禪」，成宗「國語尊稱曰完者篤」？陶宗儀沒有留下明確的答案。我們也無法證明陶宗儀沒有這種想法。我們同樣無法否認所謂「國語曰薛禪」也有「國語諡號曰薛禪」的意涵。至於「國語曰薛禪」云云，是否含有「國語廟號曰薛禪」之意在，我們則可肯定其為有。《輟耕錄》卷2〈權臣擅政〉條載：

中書右丞相伯顏所署官銜計二百四十六字，曰……。當其擅政之日，前後左右，無非陰邪小輩，惟恐獻諂進佞之不至，孰能告以忠君愛民之事。有一王爵者驛奏云：「薛禪二字，人皆可以為名。自世祖皇帝廟號之後，遂不敢用。今太師伯顏功高德重，可以薛禪名字與之。」（頁30）

元亡前夕陶宗儀寫下這條札記，以薛禪為世祖皇帝廟號，應當信而有徵，反映時人的認知。問題是，薛禪既為世祖廟號，那麼，陶宗儀寫作之時，為甚麼只說「國語曰薛禪」，而不直截了當說「國語廟號曰薛禪」？再者，他既明知成吉思汗是太祖的尊稱，為甚麼只說「國語曰成吉思」，而不明白確切地說「國語尊稱曰成吉思」？假定成吉思一名僅只用為尊稱，薛禪一名僅只用為廟號，那麼，在同一條札記中，陶宗儀不加分辨地化約為「國語曰」云云，當然難免籠統之譏，尚且容易誤導讀者。我們今日無法明確解讀「國語曰」，正坐此弊。陶宗儀難道慮不及此？我以為不然。他自有道理。今按世祖以下元朝皇帝在位之時各有漢語尊稱，死後則有漢語諡號以及漢語廟號。我認為這些皇帝生前各有蒙古語尊稱，死後成了他們的蒙古語廟號；³¹

31 元朝太廟諸帝廟室的神主（即廟主的牌位）有一定的規格，係劉秉忠於至元三年（1266）奉世祖之命攷古制而定。《元史》卷74〈祭祀三·宗廟上·神主〉條說，「以光漆題尊諡於背上。」（頁1843）沒有明確說是漢語尊諡或國語尊諡。同書同卷稍前的〈宗廟上·序

他們可能沒有蒙古語諡號。換言之，就漢語而言，元朝皇帝的尊稱、諡號、廟號，三者是不同的；就國語而言，尊稱即廟號，二而一。漢語尊稱、諡號、廟號，三者各異，尊稱、諡號用字也多，附和中國傳統的繁文縟節。蒙古人並不見得知曉漢語尊稱、諡號的字面意義。國語尊稱和廟號，二位一體，簡單一個字，清楚明白，符合蒙古人質樸無華，不事文飾的特性。推測元朝皇帝既有國語尊稱，又有國語廟號，名異實同，盡人皆知，陶宗儀固不必強為分辨，一一臚列，而僅只以「國語曰」云云帶過也。

但是，如此解讀，解決不了一個問題。讀者也許注意到前引陶宗儀文字最末「今上皇帝」即順帝條，我特地錄下的幾個字：「元統二、至元六，至正今二十六年。」假如說，薛禪等國語稱號確為尊稱，世祖在位之時既已得之，那麼，至正二十六年，陶宗儀寫下〈列聖授受正統〉之時，順帝在位已經三十三四年了，理應有其尊稱，那麼，為甚麼陶宗儀闕而不載呢？難道順帝的國語稱號兀哈篤的確不是生前的尊稱，而是死後的廟號？

四、上位名字

在傳統中國，皇帝有名諱，有稱號，有其使用規範。大致上，皇帝的名諱，不論是皇帝生前或死後，臣民需要避諱，不能使用。對在位的皇帝，或稱皇上，或稱陛下，不一而足，視情況而定。皇帝死後，或稱其諡號、廟號，或稱其陵號、年號，沒有一定的標準可循。³² 蒙古人入主中國，建立元

言〉說，至元十三年，「是歲，改作金主，太祖主題曰『成吉思皇帝』，睿宗題曰『太上皇也可那顏』，皇后皆題名諱。」（頁1833）所謂「金主」，即「木質金表牌位」（頁1832）。「成吉思皇帝」應係音譯Činggis Qaγan或Činggis Qān，「也可那顏」音譯Yeke Noyan（大官人之意），皇后名諱應指蒙古語名諱。據此可知，元朝帝后神主牌上的文字，應當是蒙古文。我們可據此進而推測前引「以光漆題尊諡於背上」云云，倘非專指蒙古語尊諡，至少亦應包括蒙古語尊諡在內。其次，「成吉思汗」原為生前國語尊稱，今題在神主牌上，亦即用為國語諡號。至於是否用為廟號，文獻無徵。但是，我很難想像忽必烈君臣會摒棄家喻戶曉的響亮尊稱「成吉思汗」不用，另外選擇其它的字眼做為開國皇帝鐵木真的廟號。同樣道理，世祖忽必烈的稱號「薛禪」，如果是他的生前尊稱，那麼，繼承其帝位的成宗鐵穆耳君臣，會另外選一個蒙古字來取代薛禪，做為忽必烈的廟號嗎？

32 參看周良霄著，《皇帝與皇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1章第1節〈關於皇帝的稱呼〉。

朝，一方面沿襲中國的傳統，皇帝生時有漢語尊號、年號，死後有漢語諡號、廟號，另一方面則保留了蒙古的固有傳統，稱最高統治者為可汗，生時如此，死後亦然。唯可汗有已故者，有在位者，如何稱呼他們，迄今尚無專門研究，只見零星的討論。而所討論者且未必能詳，仍然留有商榷的餘地，如本文討論的國語稱號問題即為一例。另外如可汗的名諱是否需要避諱的問題，我認為還可討論。

英籍蒙古史學家波伊勒（John A. Boyle）撰〈關於朮外尼書中若干蒙古宗王的稱謂〉一文，³³研究朮外尼（‘Ata-Malik Juvaini, 1226-1283，波斯人，仕伊利汗國）於1250年代成書的《世界征服者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內的五個稱謂，確認Uluγ Noyan（兀魯合那顏，大官人）指稱拖雷，Uluš-Idi（兀魯思亦的，兀魯思（國家、人民）的主人）指稱朮赤，Qa'an（合罕、哈罕，皇帝）首次用來指稱窩闊台，Otegin（Ot-tigin，灶火之主）指成吉思汗的幼弟帖木格，Beki（別吉，公主）指稱拖雷之妻唆魯合帖尼（Sorγaytani）。他認為蒙古人有不提死人名字的禁忌，於是拖雷等以上五人就有了Uluγ Noyan等以上五個死後的稱謂。他估計在漢文以及蒙古文資料中還可以發現這個習俗的其他例子。黃時鑒同意波伊勒的說法，加以推衍，說：「的確，從忽必烈時候起其他例子不在少數，因為這種蒙古習俗同中國傳統王朝的廟制結合起來，發展成了雙重廟號。」³⁴

如前所述，元朝皇帝的國語稱號是否為皇帝死後才出現的廟號，其實還有爭議。至於把Uluγ Noyan等說成是死後稱謂，我看也有問題。這需要專文來討論。這裡僅能簡單一提我的看法。

首先，我認為拖雷等人在世之時已有Uluγ Noyan等稱號，而這些合乎他們身分的稱號掩蓋了他們原有的名字，以致後者隱諱不彰，少為人知。朮外尼書少用或不用拖雷等人的名字，這或許是最重要的原因。這種情形猶如成吉思汗的名號可以家喻戶曉，但是知道他的本名鐵木真的人可能不會很多，因此之故，書中少用甚或不用鐵木真原名，原是自然而然之事。我們不能因而推論鐵木真這個名字已成禁忌。我們知道，鐵木真即位並受尊號成吉思汗

33 John A. Boyle, "On the Titles Given in Juvaini to Certain Mongolian Princ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1/2(1956): 146-154.

34 黃時鑒，〈元朝廟制的二元性特性〉，頁133-134。

之後，人們就以「成吉思可汗」稱呼他。著名的〈也相哥石〉（即〈成吉思汗石〉）立於1225年，時成吉思汗尚且身在現場，第一行即是Činggis Qayan；³⁵元朝太廟裡的金主也題爲Činggis Qayan；³⁶元代硬譯公牘屢見不鮮的「成吉思皇帝」即係Činggis Qayan的音譯兼意譯。³⁷成吉思汗的名號響亮大地，生時已然。設若要是有所禁忌，那麼，響叮噠的尊號成吉思汗，比起他較少人知的原名鐵木真，更有資格入選，因爲禁忌後者，並無多大意義。

其次，反駁Uluγ Noyan等稱號爲死後稱謂說，最直截了當的作法爲舉出實例，證明拖雷等人生前已有此等稱號。這是費日曠時的工作，請俟來日。今權以玉昔帖木兒稱號Örlüg Noyan爲例說明。按玉昔帖木兒（Üs Temür, 1242-1295）爲蒙古四大家族之一的博爾朮（Börju）之孫，服侍世祖，「世祖時嘗寵以不名，賜號月呂魯那演，猶華言能官也。」³⁸稱號Örlüg Noyan顯然爲生前所賜。玉昔帖木兒卒於成宗元貞元年（1295）十一月。他在世之時，人家稱呼他，或稱名，或稱號。以拙編《元代臺憲文書匯編》所見者爲例，稱名、稱號各見於四件公文書；死後稱名者，《匯編》無所見，稱號者則見於七件文書。³⁹稱號Örlüg Noyan生前既已有之，且已普遍行用，斷非死後稱號，毫無可疑。我們不能因爲所見文獻稱名者少，稱號者多，就認定他的名字已成禁忌，故而給他一個死後的稱號。而且，像贊美其人英明能幹的這種稱號，生前不與，死後才給，有甚麼意義呢？

35 敖力布，〈關於《成吉思汗碑銘》的研究〉，《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81.1: 35-44。道布整理、轉寫、注釋，巴·巴根校，《回鶻式蒙古文文獻匯編》（蒙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頁1-7。

36 同註31，引《元史》〈祭祀志·宗廟上·序言〉。

37 參看蔡美彪，〈涇州水泉寺碑譯釋〉，《元史論叢》3(1986): 236-239對「成吉思合罕」、「成吉思皇帝」、「合罕皇帝」諸詞的注釋；Igor de Rachewiltz, "The Title Činggis Qan/Qayan Re-examined," in Walther Heissig and Klaus Sagaster, eds., *Gedanke und Wirkung Festschrift zum 90. Geburtstag von Nikolaus Poppe*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89), pp. 281-298.

38 《元史》卷119本傳，頁2947。

39 生前稱名的文獻，有《通紀》6、12、《臺綱》5、《青崖集》〈奏議〉38等四件（頁35、41、207、419）；生前稱號者四件：《通紀》22、24、《臺綱》17、39（頁46、47、221、235）。死後稱號者七件：《通紀》27、32、64、72、《臺綱》45、46、《題記》〈附載〉1（頁48、52、66、69、239、240、543）。

最後，我想稍微談談元朝皇帝的名字的避諱問題。誠如黃時鑒說的：「蒙古前四汗時期，汗的名字是毋須迴避的，貴族與平民之間也彼此直呼其名。」其實，入元以後也是如此。茲僅補充幾條資料為證。如1247年，定宗即位之二年，陝西鄠縣草堂寺闍端太子令旨碑，即以「谷與皇帝福蔭裡」開頭。⁴⁰1257年，蒙哥汗五十大壽，駙馬八立托、公主一悉基立碑祝壽，蒙古碑文寫的就是Möngke Qayan（蒙哥可汗）。⁴¹「蒙哥皇帝」這幾個字，見於好幾方漢文「白話碑」，立碑年代有蒙哥在位（1251-1259）時，有蒙哥去世（1259.8.11）後。⁴²1305年，伊利汗完者都（Öljeitü, 1304-1316）致法王腓利普（Philippe le Bel）書，提到在中國的元朝皇帝，稱之為Temür Qayan（鐵穆耳可汗）。⁴³1328年，著名的泰定帝即位詔中稱自己的父親為「仁慈甘麻剌（Kammala）爺爺」，稱先帝為「姪碩德八剌（Šidebala）皇帝」。⁴⁴1333年，順帝即位詔稱先帝為「朕弟懿璘質班（Irinjibal）」。⁴⁵

皇帝的名字不諱，皇后的名字也不諱。武宗時，曹元用遷禮部主事，「時累朝皇后既崩者，猶以名稱而未有諡號。元用言：『后為天下母，豈可直稱其名。宜加徽號，以彰懿德。』」⁴⁶元朝太廟內皇后的金主，都題寫她們的名諱。⁴⁷《元史》〈祭祀志六·國俗舊禮〉載太廟四祭，蒙古巫祝「以國語呼累朝帝后名諱而告之。」每歲九月及十二月，行燒飯之祭，蒙古「巫覡以國語呼累朝御名而祭之。」⁴⁸每歲六月二十四日，時皇帝駕在上都，有「洒馬

40 蔡美彪，《元代白話碑集錄》（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頁15。

41 陳得芝，〈元外刺部《釋迦院碑》札記〉，《元史論叢》2(1983): 251-260。胡斯振、白翠琴，〈1257年釋迦院碑考釋〉，《蒙古史研究》1(1985): 11-20。

42 茲自蔡氏《集錄》舉例如下：1252年安邑長春觀道教真人箚碑（頁17），平遙崇聖宮給文碑一（頁18）；1253年平遙崇聖宮給文碑二（頁19）；1257年鹿邑太清宮令旨碑（頁20）；1258年忽必烈令旨二道（頁102、103）；1280年萊州萬壽宮令旨碑（頁27）；1281年忽必烈皇帝聖旨（頁105）。

43 Antoine Mostaert, C.I.C.M. et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Les Lettres de 1289 et 1305 des ilkhans Arghun et Öljeitü à Philippe le Be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55, line 23。

44 《元史》，卷29〈泰定帝紀一〉，頁638。

45 《元史》，卷38〈順帝紀一〉，頁817。

46 《元史》，卷172本傳，頁4027。

47 參看註31，引《元史》〈祭祀志·宗廟上·序言〉。

48 《元史》卷77，頁1923、1924。

妳子」之祭，蒙古巫覡及蒙漢秀才達官領其事，「再拜告天，又呼太祖成吉思御名而祝之。」⁴⁹

元末明初浙江龍泉人葉子奇所著《草木子》有一條談諱法的札記，他批評「歷代諱法之嚴」之後，接著說：「至於元朝，起自漠北，風俗渾厚質樸，並無所諱，君臣往往同名。後來雖有諱法之行，不過臨文略缺點畫而已，然亦不甚以爲意也，初不害其爲尊。以至士大夫間，此禮亦不甚講。」⁵⁰葉子奇熟悉元代掌故，他的觀察應當接近實情。

陳援庵（1880-1971）研究中國歷史上的避諱，也認爲元代最不講究避諱。他說：「避諱之繁，至宋金而極，至元則反之。《廿二史劄記》有〈元帝后皆不諱名〉一條。一部《元史》，惟〈程鉅夫傳〉言鉅夫名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餘無所見。鉅夫蓋生宋世，猶習宋人之遺風。其實元制不全用御名不避也。」所謂「不全用御名不避」，謂如程文海與武宗海山之名僅同一字，可以不避。⁵¹

關於元代皇帝名諱，還有一些記載，我們不可不提；另有一些記載，我不甚了然，更應提出來請教方家。《元史》卷7〈世祖紀四〉，至元九年八月「乙未，禁諸人以己事輒呼至尊稱號者。」這條記載的涵意不甚明確。⁵²今查得《通制條格》卷8〈儀制·臣子避忌〉內有一條說：

至元九年八月，中書省：

木八剌、脫因乃蒙古文字譯該：

「不揀誰，自的勾當裏爭競唱叫、折證錢債其間裏，不揀甚麼田地裏，上位的大名字休題者。那般胡題著道的人，口裏填土者。教省官人每隨處省諭

49 《元史》卷77，頁1924。

50 葉子奇，《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59。

51 陳垣，《史諱舉例》（勵耘書屋刻本，1933），卷8，頁104下-106上。《元典章》卷31〈科舉程式條目〉（頁11下）及《元婚禮貢舉考》（王頌點校《廟學典禮（外二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頁159）〈中書省續降條畫〉具載：「一、試卷不考格：犯御名、廟諱，偏犯者（非）；及文理紕繆塗注乙五十字以上。」兩書所載條文皆有「非」字，文義不通，疑係衍字。《元典章》卷28〈表章回避字樣〉條有「除全用御名、廟諱不考外」（頁4下）云云，可知御名若兩字，必兩字全犯（偏，遍也。），始得不考。只犯一字，猶得考之。此可證「非」字確爲衍字。

52 《元史》卷105〈刑法志四·雜犯〉：「諸鬪爭折辨，輒提大名字者，罪之。」（頁2688）與本紀所載，同出一源。

者。」聖旨了也。欽此。⁵³

這條資料，《元典章》也有記載，惟用字稍有不同，如「唱叫」作「喝叫」，「休題」、「胡題」作「休提」、「胡提」。⁵⁴兩者應當同出一源。《元史》所載應是高度濃縮同源文件而來。「輒呼至尊稱號」與「休題上位大名字」兩者文義已有出入。皇帝名字不是不可以提，而是不該在不適當的場合提。這與皇帝名字需要避諱與否無關。魯不魯克（William of Rubruck）記述拔都堂姪不里醉酒時提到拔都的名字，拔都令人把他砍頭，與其說是拔都「不允許下屬冒犯自己的名字」，⁵⁵毋寧說是拔都不喜歡醉酒的人隨便提自己的名字。

《元典章》載錄一件頗為費解的公文書，也與皇帝名字是否需要避諱的問題有關。茲先抄錄全文如下：

〈上位名字〉

至大元年，行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樞密院呈：

至大元年正月十四日（1308.2.6），本院官奏：

世祖皇帝登了寶位，在後完者都皇帝登寶位呵，多人每犯着上位名字的，交改了有來。如今，皇帝登了寶位也。皇帝在軍上時分，為軍情勾當的上頭，寫着上位的名字，樞密院裏與將來的文字也有，為人的勾當與將來的也有。皇帝登了寶位之後，在先潛邸時分，聖旨了的勾當來，麼道，只寫着上位的〔名〕字來的文字也有。多人每犯着上位名字的也有。〔如今，改了年，是的其間，多人每裏頭犯着上位名字的，〕俺在先已行了的文字裏差寫了的也有。交更改了，省諭多人，各衙門裏寫文字呵，怎生？麼道，奏呵，奉聖旨：「各處寫（＝行與）文字，犯着咱每名字的有的，交更改了者。」如今，皇太子根底啓知有。麼道，啓呵，奉令旨：「那般者。」欽此。⁵⁶

53 元朝官修《大元通制》88卷，分〈制詔〉〈條格〉〈斷例〉〈別類〉，英宗至治三年（1323）頒行，今存22卷，具屬〈條格〉一綱。國立北平圖書館於1930年據明初墨格寫本影印，題《通制條格》。黃時鑒據此本校，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於1986年出版，列為《元代史料叢刊》之一。近年，方齡貴出版《通制條格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廣徵博引，以為參證，甚便學者。引文見墨格寫本影印本，卷8，頁2上；黃時鑒點校本，頁125。方齡貴校注本，頁339。我們的標點不盡相同。

54 《元典章》，卷53〈大名字折證的休提〉，頁20上。

55 黃時鑒，〈元朝廟制的二元性特性〉，頁133。

56 《元典章》卷28，頁6下-7上。奏文內「〔名〕字」，據下引《條格》本補。方括號〔〕內文字為《條格》本所無有。「寫文字」，《條格》本作「行與文字」。

《元典章》編纂者題爲〈上位名字〉的這件公文書，也見錄於《通制條格》卷8〈儀制〉篇，爲〈臣子避忌〉條下所錄兩件公文書之一。由於這件硬譯公牘語涉曖昧，不好了解，而兩書所載，字句稍有不同，合而觀之，或有助解讀，因將《條格》所載，亦行轉錄如下：

至大元年正月十四日，樞密院奏：

世祖皇帝登了寶位，在後完澤篤皇帝登了寶位呵，多人每犯著上位名字的，教更改了有來。如今，皇帝登了寶位也。皇帝在軍上時分，爲軍情勾當上頭，寫著上位的名字，樞密院裏與將來的文字也有，爲人的勾當與將來的也有。皇帝登了寶位之後，在先潛邸時分，聖旨了的勾當來，麼道，只寫著上位的名字來的文字也有，多人每犯著上位名字的，[……]俺在先已行了文字裏差寫了的也有。教更改了，省諭多人，各衙門裏行與文字呵，怎生？麼道，奏呵，奉聖旨：「各處行與文字，犯著咱每名字的有呵，教更改了者。」如今，皇太子根底啓知有。麼道，啓呵，奉令旨：「那般者。」敬此。⁵⁷

這件硬譯公牘的蒙文原件已經不存，譯文生硬晦澀，著實難解。諸如「在先潛邸時分，聖旨了的勾當來」，「改了年，是的其間」等，是何意思，竟無脈絡可尋。據我一知半解，這件文書透漏幾件訊息。第一、所謂上位名字，指皇帝出生時的名字，不包括皇帝的蒙古語稱號，否則，樞密院官就不應稱呼成宗爲完澤篤皇帝。第二、世祖、成宗曾禁止人們「犯著上位名字」。第三、武宗潛邸時代致朝廷書，曾「寫著上位的名字」。第四、當時人們「犯著上位名字」的所在多有，故前有世祖、成宗之禁，今有武宗之禁。問題是：怎樣才算「犯著上位名字」。按世祖名忽必烈，武宗名海山，元人以此爲名者罕見，但與成宗同名鐵穆耳者則不可勝數。據此推論，「犯著上位名字」，恐與中國傳統所謂的避諱無關，元廷並不禁止人民和皇帝同名（蒙古名）。元廷發布這件文書，用意大概在於禁止臣民在官方文書裡直接稱呼當今皇帝的名字，而要求使用其他的表達方式，如皇上、陛下、今上、皇帝、上位等的蒙古同義語。元朝皇帝也許認爲這樣才是對皇帝寶座的最大尊重。

但是，禁在公文書上寫上位名字有一個例外——皇帝自身。蔡美彪《元代白話碑集錄》所錄元朝皇帝聖旨提到太宗都在「皇帝」兩字之前冠上他的

57 《通制條格》影印本，卷8，頁2下-3上；黃時鑒點校本，頁126。我的標點與點校本略有不同。又，前引《典章》本有「如今……」等字，爲《條格》本所無，今以[……]標識之。

名諱「窩闊台」。順帝聖旨提到寧宗也直呼其名諱「亦憐真班皇帝」。⁵⁸

《元史》〈順帝紀一〉載，至元元年夏四月二十七日庚辰（1335.5.21），「禁犯御名」。這一記載，同樣語涉曖昧。御名有蒙古語原名，有漢語譯名，而漢語譯名無定字，怎麼才算「犯」呢？

附帶一提武宗、仁宗名諱的元人記載。袁桷撰〈玄教大宗師張公（留孫，1248-1322）家傳〉有曰：

〔至元〕十八年七月，皇曾孫生，是為武宗。上命（留孫）擇嘉名以進。是歲，分翰林、集賢院為兩，道教專掌集賢，始自公議。二十二年，仁宗生，復召命名。今二帝廟諱雖用國語，皆以公名義釋之。⁵⁹

按元朝皇帝的名諱，何人所取，何所取義，除成吉思汗名諱鐵木真外，我們知之甚少。⁶⁰袁桷的記載可稍補缺憾，惟仍有語焉不詳之處。按武宗廟諱海山，仁宗廟諱愛育黎拔力八達，袁桷謂為「國語」，姑不論是否精確，所謂「雖用國語，皆以公名義釋之」云云，是不好了解的。查虞集撰〈張宗師墓志銘〉，也提到張留孫為皇曾孫即武仁兩兄弟命名的事，說：

時太皇太后在興聖宮，仁宗皇帝在東宮，並待以優禮。武宗、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世祖為制名，興聖宮記其事，是以贊書及之。

惟所謂記事、所謂贊書，已經不傳，武仁二帝命名之詳，不能聞矣。又查趙孟頫撰有〈上卿真人張公碑銘並序〉，云：

武宗、仁宗之始生也，上皆命公擬名以進。仁宗五歲時，譯為梵文，今廟諱是也。

張留孫替仁宗取名，袁桷沒有明確說是用漢語或用國語，據所說「今二帝廟諱雖用國語，皆以公名義釋之」來推測，用的應當是漢語，後來才意譯為「國語」。這一推測，趙孟頫的記載可以證明為近乎事實：我說後來，趙孟頫

58 Ögödei 窩闊台、Irinjibal 亦憐真班各有諸多異譯，茲不備舉。

59 袁桷，《清容居士集》（《四部叢刊》本）卷34，頁16下-17上。

60 也速該搆塔塔兒部長鐵木真以歸，其妻月倫適生一子，「因以所獲鐵木真名之，志武功也。」見《元史》〈太祖紀〉，參照《元朝秘史》第59節。又與元室成員命名相關之記載，尚有一條，見元代僧人念常所編《佛祖歷代通載》（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3），卷35，頁410，云：「帝誕生太子，詔海雲國師摩頂立名。奏云：世間最尊貴，無越於真金。」帝謂世祖，太子真金先父卒。

明確說是仁宗五歲時，即至元二十六年（1289）；我說意譯為「國語」，趙孟頫明確說是「譯為梵文」。仁宗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據推測，是由「愛育黎」與「拔力八達」組合而成，前者音譯梵語 *Ayur*，意為長壽，後者疑源自藏語 **-parpata* 或 **-paribhadra*，意為藥。愛育黎拔力八達，意即「長生不老藥」。⁶¹

五、結 語

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究竟是皇帝生前既已有之的尊稱，或者是皇帝死後後人追贈的廟號，抑或是生前尊稱沿用為死後廟號，可說是還不能澈底解決的一個問題。三種說法各有有利於己的證據，卻沒有一種說法可以化解對方的所有質疑。我們可以把稱號成吉思汗暫且旁置不論，因為太祖鐵木真生前的尊稱成吉思汗，後來書寫在他的神主牌位上，供奉在太廟裡，這一事實對於尊稱說者、廟號說者、尊稱廟號合一說者而言，都是信而有徵，既可以支持自己的主張，而又不能拿來質疑對方的。

尊稱說者可以援引波斯史家拉施特丁的記載，證明元成宗鐵穆耳汗生前已有尊稱曰完澤篤，但是，這是一條孤證，而且不能推及其他皇帝，謂世祖的稱號薛禪、武宗的稱號曲律等等，也是生前的尊稱。其次，假使薛禪、完澤篤、曲律等等，確為生前尊稱，《元史》諸帝紀為何緘默不語？再者，假使兀哈篤確是順帝生前尊稱，那麼，順帝在位三十多年後，理當已經有之，那麼，陶宗儀札記〈列聖授受正統〉，列載諸帝國語稱號之時，何以不見順帝的稱號？尊稱說者很難回答這些問題。

廟號說以《元史》為濫觴，流傳最廣最久。但是，《元史》諸帝紀文所記已不一致，或說是廟號，或說是諡號，或泛曰國語。再者，《元史》記載這些國語稱號，除太祖稱號成吉思汗、英宗稱號格堅外，其餘稱號都是在諸帝本紀末尾緊隨漢語廟號之後出現的，讀來彷彿漢語廟號、國語稱號都是同一時日追給已死的皇帝。然而，該處紀文漢語廟號的記載往往抵觸他處的相關記載，故隨記在後的國語稱號也就很難肯定就是當時方才追給已故的皇

61 詳見業師柯立夫 Francis W. Cleaves, "The Bodistw-a Čari-a Awatar-un Tayilbur of 1312,"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1/2(1954): 120-121, note 309 對伯希和 (Paul Pelliot) 的攷證的介紹。

帝。簡言之，《元史》紀文記載國語稱號的出現日期並不可靠。我們找到幾條資料可以證明武宗稱號曲律、仁宗稱號普顏篤、文宗稱號札牙篤，其出現的日期要比三帝本紀末尾所說的日期來得早。廟號說者很難對此圓滿解釋。

尊稱廟號兩說，各有難題，無望解決。茲所提出的尊稱廟號合一說，並非單純的調和兩說，折衷其間，而是受到下列事實之啓發而發：

第一、太祖稱號成吉思汗既為生前的尊稱，又用為死後的廟號，尊稱、廟號合一，那麼，薛禪、曲律等稱號也有可能既是尊稱、又是廟號。前文指出，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稱號「也可那顏」應該是他的生前尊稱，而元朝太廟裡他的牌位上寫的正是「太上皇也可那顏」，⁶²這是生前尊稱又用為死後廟號的又一個例。應當指出，睿宗拖雷只在父皇成吉思汗死後短暫攝政，沒有當上可汗。類似的例子是世祖忽必烈時代大臣玉昔帖木兒，他生前有尊稱曰「月呂魯那顏」，死後人們仍稱他為「月呂魯那顏」。似此之類生前死後，一名以貫之的實例，假以時日，應當可以發現更多。鑑此思彼，世祖以下諸帝國語稱號，很有可能既是尊稱又是廟號，二而一的。

第二、稱號成吉思、薛禪、完澤篤、曲律等等，尊稱也罷，廟號也罷，都是一個單詞，簡單明瞭，易懂易記，符合蒙古人渾厚質樸、不事文飾的特性。漢族傳統的那一套繁文縟節，既有名、又有字、又有號，諡上加諡、號外有號，蒙古人不懂。鐵木真、拖雷父子初生有名，在世有尊稱，死後即以尊稱題於神主，用為廟號，夠了。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薛禪等等，《元史》謂為諡號、謂為廟號，很可能原本就是生前的尊稱。

第三、順帝末年，陶宗儀寫下札記〈列聖授受正統〉，只說稱號成吉思汗、薛禪、曲律等等為「國語」，沒有明確分辨何者是生前尊稱，何者是死後廟號，原因恐怕在於尊稱廟號二者合一之故，而不是陶宗儀記載錯誤。但是，合一說者也面臨尊稱說者同樣的難題：陶宗儀這條札記為何不見順帝的蒙古語稱號？

第四、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元史》紀文或謂為諡號，或謂為廟號，看來可能都對。按太祖的漢語諡號原為聖武皇帝，後來加諡為法天啓運聖武皇帝，漢語廟號是太祖。《元史》不提他有甚麼國語諡號或廟號，但《元史》明確指出太祖的金主題曰「成吉思皇帝」。相對於漢語諡號，「成吉

62 同註31，引《元史》〈祭祀志·宗廟上·序言〉。

思皇帝」可說是太祖的蒙古語諡號。至於廟號，除了「成吉思皇帝」之外，元朝人恐怕不會另外給他一個吧。諡號和廟號，對漢人而言，有別；對蒙古人而言，可能沒有甚麼分別。這或者就是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有人以為是諡號、有人以為是廟號的原因。

第五、假使薛禪等稱號確為皇帝生前的尊稱，受於在位的某年月日，那麼，《元史》該帝紀該日條下理應有所記載，然而，這些稱號（太祖成吉思及英宗格根除外）卻是記錄在諸帝本紀之末，緊隨漢語廟號之後。這是尊稱說者以及合一說者共同的難題。我推測，《元史》諸帝紀的撰文者，肯定知道，自世祖以下，除少數例外，元朝皇帝各有其蒙古語稱號，或用於神主（故曰諡號），或用為廟號，惟不知此等稱號授受於何時，無法依其月日入於紀中相應位置，故權宜附記在漢語廟號之後。部分撰文者或許知道這些稱號原本就是生前的尊稱，也因同樣緣故，故亦權宜附記在紀末。他們具未加注說明，以致後人有所誤讀。

總之，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薛禪、曲律、完澤篤、普顏篤等等，《元史》編者以為是皇帝死後才得到的廟號或諡號，復旦大學姚大力教授以為是皇帝生前已經有之的尊稱，我則以為這些稱號原來就是生前尊稱，死後沿用為廟號。是耶非耶，尚祈指教。⁶³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元·佚名撰，《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四部叢刊》本。

63 拙稿草成後，承姚大力教授惠寄一文，為羅新教授所撰，題曰〈可汗號之性質——兼論早期政治組織制度形式的演化〉，係羅氏在「多元視野的中國歷史——第二屆中國史學國際會議」（2004年8月22-24日在北京清華園舉行）上宣讀的論文。羅文指出從柔然到高車到突厥，從吐谷渾到鐵勒諸部到契丹，所有的可汗都有可汗號（例如柔然社輪號為豆代可汗，一作丘豆伐可汗；社輪為名，豆代為可汗號。），而「可汗號應當是在可汗即位的典禮上獲得的。」返觀蒙元皇帝，除了鐵木真的可汗號「成吉思」的確是在即位大典上獲得的之外，其它諸帝的可汗號，也就是拙文所謂的蒙古語稱號，其出現時間，學者已有生前、死後之爭，遑論一個更為明確的時間點。羅文引《北史》〈蠕蠕傳〉，有曰：「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中國立諡。即死之後，不復追稱。」蠕蠕可汗號得之於生前，沿用於死後，這一事例，對我們研究蒙古可汗的稱號性質，深具啟發意義。

- 元·佚名撰，札奇斯欽譯註，《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
- 元·釋祥邁撰，《大元至元辨僞錄》，收入《新編縮本乾隆大藏經》第14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1。
- 元·釋念常編，《佛祖歷代通載》，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3。
- 元·佚名編，《大元聖政國朝典章》，臺北：故宮博物院，1972。景元刻本。
- 元·官修，《大元通制條格》，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0。影明初墨格寫本。
- 元·官修，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
- 元·官修，黃時鑒點校，《通制條格》，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元代史料叢刊》本。
- 元·虞集等編，《經世大典》內〈站赤〉篇，轉錄在明·姚廣孝等，《永樂大典》卷19416-19423，「勘」字韻。
- 元·王士點、商企翁編，高榮盛點校，《秘書監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元代史料叢刊》本。
- 元·張伯淳撰，《養蒙先生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元代珍本文集彙刊》本。
- 元·袁桷撰，《清容居士集》，《四部叢刊》本。
- 元·虞集撰，《道園學古錄》，《四部叢刊》本。
- 元·蘇天爵輯，《國朝文類》，《四部叢刊》本。
- 元明間·陶宗儀著，文灝點校，《南村輟耕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
- 元明間·葉子奇著，《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 明清間·佚名編，朱風、賈敬顏譯，《漢譯蒙古黃金史綱》，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 清·羅卜桑丹津編著，札奇斯欽譯註，《蒙古黃金史譯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
- 清·吳廣成撰，龔世俊等校證，《西夏書事校證》，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
- 波斯·朱凡尼（'Ala-ad-Din 'Ata-Malik Juvaini）著，英人Boyle, John A.英譯，*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波斯·拉施特丁（Rashid ad-Din）著，余大鈞、周建奇據俄譯本譯，《史集》（*Jami* '）

al-Tawarikh) 第1卷第1分冊,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3。

二、近人論著

- 文廷式 1943 《純常子枝語》, 朱印本。
- 王愼榮、葉幼泉、王斌 1991 《元史探源》,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 周良霄 1999 《皇帝與皇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邱樹森主編 2002 《元史辭典》, 濟南: 山東教育出版社。
- 洪金富 2003 《元代臺憲文書匯編》, 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洪金富 2004 《遼宋夏金元五朝日曆》, 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胡斯振、白翠琴 1985 〈1257年釋迦院碑考釋〉, 《蒙古史研究》1: 11-20。
- 烏 蘭 2000 《蒙古源流研究》, 瀋陽: 遼寧民族出版社。
- 敖力布 1981 〈關於《成吉思汗碑銘》的研究〉, 《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81.1: 35-44。
- 陳 垣 1933 《史諱舉例》, 勵耘書屋刻本。
- 陳得芝 1983 〈元外刺部《釋迦院碑》札記〉, 《元史論叢》2: 251-260。
- 黃時鑒 1993 〈元朝廟制的二元性特性〉, 《元史論叢》5: 131-135。
- 道布整理、轉寫、注釋, 巴·巴根校 1983 《回鶻式蒙古文文獻匯編》(蒙文),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蔡美彪 1955 《元代白話碑集錄》, 北京: 科學出版社。
- 蔡美彪 1986 〈涇州水泉寺碑譯釋〉, 《元史論叢》3: 236-239。
- Boyle, John Andrew. 1956. "On the Titles Given in Juvaini to Certain Mongolian Princ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1/2: 146-154.
- Cleaves, Francis Woodman. 1954. "The *Bodistw-a Čari-a Awatar-un Tayilbur* of 1312."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1/2: 1-129.
- de Rachewiltz, Igor. 1989. "The Title Činggis Qan/Qayan Re-examined." In Walther Heissig and Klaus Sagaster, eds., *Gedanke und Wirkung Festschrift zum 90. Geburtstag von Nikolaus Poppe*.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pp.281-298.
- Mostaert, Antoine C.I.C.M. et Cleaves, Francis Woodman. 1962. *Les Lettres de 1289 et 1305 des ilkhan Arjun et Öljeitü à Philippe le Be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e Mongolian Titles of the Emperors of the Yüan Dynasty

Chinfu Hung *

Abstract

Each of the nine emperors of the Yüan dynasty had a Mongolian title, but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such titles were granted to ruling emperors as an honorific title or to already deceased emperors as a temple name. Whil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title “Činggis Qayan” was used as an honorific title when Emperor Temüjin was alive, and was also used to name his temple room when it was set up,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other eight titles, such as “Sečen Qayan” of Emperor Qubilai, are far less clear. *The History of the Yüan Dynasty (Yüan shih)* and scholars who follow this text tend to view such titles as temple names, but one modern scholar has recently argued that these titles were actually given to emperors during the time of their reigns. Having inspected a variety of sources in Chinese, Mongolian and Persian languages, this article questions the validity of the two aforementioned interpretations. In their place, it advances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Mongolian titles of Yüan emperors were both honorific titles and temple names, because exactly the same title was first presented to an incumbent emperor and later used to name his temple posthumously.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a related issue, namely, the avoidance of the use of Mongol Khaghan’s names during the Yüan dynasty.

Keywords: Yüan dynasty, Mongolian titles, honorific titles, temple names, avoidance of an emperor’s name

* Chinfu Hung is a research fellow i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t Academia Sinica.